

罗志田 著

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

陈平原
主编

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

罗志田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/罗志田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-7-309-07427-7

I. 变… II. 罗… III. 文化史-中国-近代-文集 IV. K250.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3795 号

本书原系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的“三联人文书系”之一种,以书名《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》出版,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。

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

罗志田 著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陈 军 胡春丽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25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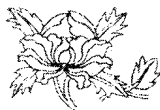
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7427-7/K · 293

定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

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，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，反响颇佳。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，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，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。蒙香港三联授权，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，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。

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，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，无不精妙绝伦，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，以为简体版弁言，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。

“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‘专著’不同”，陈平原先生坦言：“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；就连自家买书，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，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。前年撰一《怀念‘小书’》的短文，提及‘现在的学术书，之所以越写越厚，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，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，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’。外行人以为，书写得那么厚，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。其实，有时并非工夫深，而是不够自信，不敢单刀赴会，什么都来一点，以示全面；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。只是风气已然形成，身为专家学者，没有四五十万字，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。”

关于该丛书的编选，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，“与



其兴师动众，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，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，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‘英雄谱’，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，这既非学术史，也不是排行榜，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，以他的眼光、趣味与人脉，勾勒出来的‘当代中国人文学’的某一侧影。若天遂人愿，旧雨新知不断加盟，衣食父母继续捧场，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，我相信，这一‘图景’会日渐完善”。

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，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：“第一，作者不限东西南北，只求以汉语写作；第二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，目前仅限于人文学；第三，不敢有年龄歧视，但以中年为主——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，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。”

于今，陈先生的宏愿，经由我们的“加盟”和大陆读者的捧场，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；无论如何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，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。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2010年7月

自序



中国近代以“变”著称，可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代。其最为显著的转变，自然是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一几千年才出现的变化。当近代读书人纷纷表述对于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”的担忧时，他们不过是预感到大变之将至，尚未真正认识到后续变局的根本性；但其开始以“千年”甚或更长的时段来思考时局的变动，却不能不说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。梁启超在1901年便指出，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“过渡时代”（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所谓“停顿时代”）。按其预测，将要发生的“过渡”包括政治上的“新政体”、学术上的“新学界”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“新道德”¹。

这已是全盘的转化，但梁氏那时所说的“新政体”指的仅是君主立宪，他并不想要鼓动更换政权的“革命”。后来的发展虽超出其预测，仍多少有些被梁启超不幸而言中的意味：近代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巨变，的确是全方位的，包括了政治、社会、思想、学术等方方面面。而且这个大变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，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，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（所

¹ 梁启超：《过渡时代论》（1901）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六》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27—30页。



以一些读书人才能有所预感)，此后仍在延续¹。

变动时代最明显的特征，就是产生出“动”就是好的观念。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总结中国过去五十年的“进化”概况，颇抱愧于没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，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“读书人的脑筋，却变迁得真厉害”；以至于“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，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”。梁氏把四千年的思想界比作“一个死水的池塘，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，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”；如今终于有了动的气象，虽其“流动的方向和结果，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，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，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”²。

“进化”在当年是个非常正面的词汇，只要“由静而动”，不论往什么方向发展都是“进化”，这一价值判断充分体现出对变动的期盼，而立说者本身因焦虑心态而生的紧迫感也昭然若揭³。梁启超的言外之意很明确，他显然对已经发生的全方位巨变仍不满意。这就提示出变动时代的另一个明显特征，即尽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急剧而重大的变动，但很多人，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读书人，仍觉得变动不够快也不够大。

报人张季鸾在1931年回顾20世纪前三十年的历史说，“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，实已经重大之变迁。盖由帝制以至共和，由党政以至党治，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。就中国论，为开创五千年未有之新局。”尽管如此，

1 梁漱溟对此颇有体会，他曾说：“若就革命是‘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，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’来说，辛亥一役应承认其为革命。它并且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。自它以前社会构造未曾变过，自它以后，社会构造乃非变不可。……今天我们尚在此一变革中，而正期待一新构造新秩序之出现。”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（1949），《梁漱溟全集》第3卷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24页。

2 梁启超：《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》（1923）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三十九》，第43页。

3 这样一种不管怎样先动起来的急迫心态当年是较为普遍的。可资对比的是，一般以为较温和的胡适，在北伐时曾有“我们要干政治”的想法，也是主张于“什么制度都可以”。当时《晨报副刊》上就有文章指出，胡适“明显地流露出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”的倾向。参见罗志田：《再造文明的尝试：胡适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260—267页。

他仍以为“民国以来，其实质未变”。盖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，“虽近代史上之两个时期，而实一大问题之继续演进”，而且是一个“迄今未臻完全解决”的问题。所以他的整体结论是：“旧秩序已崩溃，新改革未成功。”¹

张氏显然期盼着“革命”会带来很多正面的转变，但他所看到的民国则“愈变而劣”：表现在“民生愈困苦，吏治愈贪污；教育实业，俱少进境”。而“所增加者，徒为若干军阀与无数游民盗匪”。这些负面印象可能带有一些想象成分，而他对时局强烈的不满背后，隐伏的仍是近代读书人那种持续的焦虑心态和危机感。此时离北伐不过数年，则张氏对新当政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肯定。在他眼里，1926年以来数年的历史尤以变化剧烈为特征：“从张、褚督直，至北伐成功；从晋阎卫戍，至中央讨伐；从国共混淆，至清党剿匪；从张雨亭开府北京，至东三省拥护统一；其变化之剧烈，动如南北之极端。”

短短五年间，那种直接向对立面转化的政治变动已经好几次了。梁启超曾描述历史的“革命性”说：“革命前、革命中、革命后之史迹，皆最难律以常轨。结果与预定的计划相反者，往往而有。”²若据其所论，张季鸾所见北伐后五年的情形，便带有类似的“革命性”。而此并非特例，徐世昌在1918年也曾说，“民国成立以来，革命之役已四五见”³。能称得上“革命”的，自非一般的小动乱，竟然在五六年间“已四五见”，几乎是年年都有，相当能体现当时政治变动的频繁。可知近代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巨变，本是由许多也不算小的系列变动所构成。

1 本段与下段，张季鸾：《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》，《大公报》（天津）1931年5月22日，第1版。

2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七十三》，第117页。

3 徐世昌之演说，见《昨日怀仁堂盛会》，《晨报》1918年12月1日，第6版。



与近代政治、经济真可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剧变¹相比，文化层面的变动相对来说更带隐而不显的特征。尽管人们口中常说“中国文化”，实则“文化”一词的含义，百多年来始终没有充分的共识。今日通用的“文化”一词，大致是个外来词；而它在其原初产地的界定，也一直是众说纷纭。唯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方面书斋学者不断在那里推敲、分疏其定义，另一方面这又是中外皆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汇；且多数人在使用时并不觉得有加以界定的必要，似乎对他们而言，“文化”自有其约定俗成的指谓。

这样看来，对“文化”的理解和使用，在学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（*tension*）。这一雅俗冲突的现象，并非几句话可以简单说清楚。大体而言，“文化”的意谓，很多时候视其表述者和语境为转移，我们只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表述，并将其置入其出现的上下文之中，多少都能领会到表述者之所欲言。

中国古代对“文化”的早期认识，是以人为中心的，又颇注意所谓“天人感应”的一面，强调其时空的意义。《易经》所谓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《易·贲》）一语，就被很多后人视为“文化”的出处，近代读书人常据此以发展出可以和“文化”那个外来词相通的解释。

梁启超借用佛家术语给“文化”下的定义是：“文化者，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。”其中又包括“业力不灭”和“业力周遍”两种公例，前者即人的一切身心活动虽随起随灭，但“每活动一次，他的魂影便永远留在宇宙间，不能磨灭”；后者则说个人的活动势必影响到别人，有的“像细雾一般，霏洒在他所属的社会乃至全宇宙，

1 不仅政治上西式的共和制取代帝制，经济方面出现的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，也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。

也是永不磨灭”¹。关于共业之有无“价值”，他也有自设的定义，这且不论。但业力的“不灭”和“周遍”两种公例，便很能凸显前述时空的含义。

史家钱穆后来也说：“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，就叫它做文化。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，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，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。”换言之，“凡文化，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”。故文化“并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”。他进而说，“一人的生活，加进长时间的绵延，那就是生命；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，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、历史演进，便成所谓文化”。则“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。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，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”。也因此，讲文化“总应该根据历史来讲”²。

这样，“文化”实际成为“文化史”，倒与胡适稍早对“国故”的概念接近。胡适曾说：“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，国学的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，国学的目的是要作成中国文化史。国学的系统的研究，要以此为归宿。”在他看来，“理想中的国学研究”，至少是一个“中国文化史”的系统，包括民族史、语言文字史、经济史、政治史、国际交通史、思想学术史、宗教史、文艺史、风俗史和制度史等十种专门史³。

类似的观念那时为很多人所分享，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在1924年也说：“整理国故，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。”⁴而梁启超更明言：“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、狭义二种：广

1 梁启超：《什么是文化》（1922）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三十九》，第98页。

2 钱穆：《国史新论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346—347页。

3 胡适：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，《胡适文集》，欧阳哲生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册，第14—15页。

4 顾潮主编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97页。

义的包括政治、经济；狭义的仅指语言、文字、宗教、文学、美术、科学、史学、哲学而言。”¹故他在讨论专门史和普遍史两种类别时就说，“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。”²

由于“文化”本有广狭二义，“文化史”的定义也须从其语境中确定。梁启超曾论《世本》一书的特点，说其“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；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，彼乃详及氏姓、居、作等事，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”³。这里的“文化史”，便是狭义的。也正因此，何炳松在1924年不得不强调：文化“即文明状况逐渐变化之谓”。故“文化史应以说明一般状况之变化为主。若仅罗列历代典章制度、文人艺士为事，充其量不过一种‘非政治的’过去事物之列肆而已，非吾人所谓文化史也”⁴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界定，何氏所欲区分的，恰是后来较常见的，很多所谓“文化史”，的确是在“非政治的”方面着力。

本书所说的“文化”也是较为广义或开放的，略近于今日人类学意义的文化（定义也各不同，姑取其宽泛的一面），比较关注传统、价值系统、观念形式和各类建制（institutions）；但这些皆非悬空议论，而是落实在各类人的具体生活经历和体验之中；具体主要侧重于社会层次、生活习俗、思想观念、学术状况与集体心态等。若与传统专门史类别比较，相对更少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的内容，而更接近于社会、思想、学术和生活等专史的综合，同时也关注其他专门史中影响到一般人生活和心态的各层面。

但本书无意于整体构建这样一种“文化史”，更多毋

1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（补编）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九十九》，第124页。
2 梁启超进而申论说：“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。作普遍史者，须别具一种通识，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，而贯穴乎其间，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，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。”参见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七十三》，第35页。
3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七十三》，第15页。
4 何炳松：《五代时之文化》（1925），《何炳松论文集》，刘寅生等编，商务印书馆，1990年，第248页。

宁是从文化视角考察新旧中西各方面的接触、碰撞、交流和相互依存、竞争及错位，以及因此而出现在近代中国这一时空之中的社会、思想、学术等方面的一些现象。虽不多论及政治，却始终不忘这些面相与政治的密切关联。实际上，面对近代这样的大变局，又秉持一种相对广义的文化视角，要进行所谓系统的考察，实非鸿篇巨制不能为。以本书的篇幅，也只能选取一些片段，尽可能从整体的眼光去观察，希望将各方面多层次互动的动态图景，包容在近代文化的点滴履迹之中。杜甫所谓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那种尺幅千里的意境，虽不能至，实心向往之。

另一方面，如陈寅恪所说：“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；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”¹这里最需要的，就是所谓历史想象力。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，历史想象的基础和限制，都在史料之上。近代存留下来的史料固然远比古代更丰富，若与当时曾经存在的材料相比，仍不过“残余断片”而已；叙述时留有余地，可能还更接近“其时代之真相”。

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：“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！今子之所言，犹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岂履哉！”这是《庄子·天运》中所言，义甚悠远²。在司马迁的记载里，老子是这样对孔子说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”³此语或本《庄子》，而意有所移。从史学角度言，司马迁的态度更积极。其意或谓言

1 陈寅恪：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上册审查报告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79页。

2 既然先王之陈迹未必是其“所以迹”，则后现代文论所谓文本的独立生命，似亦可由此案解。

3 司马迁：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1959年，第7册，第2149页。



在，固未必非人在不可；迹固非履，似亦可由迹以知履（此履指动作）¹。

要理解领会六经之文本，固当深究其文字，更当朝着“履之所出”的方向努力探寻“所以迹”的一面。六经及其所承载的“道”并非凭空而至的虚悬“理论”，它们有其作者（不必是一时一人），有其目的和针对性（不必是单一的），有其产生和形成的语境，及其生成的动态过程。换言之，言亦是行；围绕“立言”的行为这一切所能告诉我们的，绝不少于言说本身的文字意谓²。

进而言之，《庄子》所说之“迹”和司马迁所说之“言”，不必一定落实在文字之上；任何人造物体皆能反映也实际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，亦皆其“迹”其“言”。若立言之骨尚未朽，更增添了意想其“生人”的可能。《韩非子·解老》说：“人希见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案其图以想其生也。”³后日之古生物学正类此，考古学亦仿此法，藉以复原各种已不可见的古之事物。引申言之，梁启超所谓使历史“僵迹变为活化”的方式也多少类似，即“因其结果，以推得其情态；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，再现于今日”⁴。

章学诚没有司马迁那么乐观，但他显然领会了《庄子》之深意，故指出：“人之所以谓知者，非知其姓与名也，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；读其书，知其言，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。”这里点出的“所以为言”，正是《庄子》所谓“所以迹”之意；后人很多时候会出现“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”

1 本段与下段，并参阅罗志田：《事不孤起，必有其邻：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4期。

2 参见Quentin Skinner, "Visions of Politics", vol. I, *Regarding Method*,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2, pp.103-127.

3 按《韩非子》接着说“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，皆谓之象也”，别有深意，此不赘。前引司马迁的话，恰出于《老子韩非列传》之中，不排除他写作时心中正有此韩非子“解老”的见解。

4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七十三》，第1—2页。这当然是一种借助后见之明的倒放电影取向，不能不审慎使用。

的现象，恐怕即因为没有朝着昔人“所以为言”的方向去努力探索。盖古人立言，自“有其忧与其志”。用今日的话说，古人之“忧”与“志”，即其立说之动机和意图之所在。要使其所言不至于“湮没不章”，就要能“忧其忧、志其志”¹。

因此，章氏把孟子的“论世知人”说提高到“文德”的程度，特别强调“论古必恕”的重要。他解释说，“恕非宽容之谓”，而是指“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”；若“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；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处，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”²。我们当然首先依靠今昔之“同”来理解古人，但还要进而探索和尊重古今之“异”。治史者在考索前人所遗之“言”时，倘能尽量再现实言者之“人与骨”及立说之语境，顺其“所以为言”的方式和方向认识其所言³，理解必更进一层，庶几可趋近“接以迹”亦“接其心”的境界。

即使“言”为文字，其“迹”也有虚实之分。朱熹说：“礼即理也，但谓之理，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；制而为礼，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。”⁴这是极有识见的观察和归纳。据司马迁所引，孔子曾说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朱子或即本此而申论之。任何“空言”，本亦皆有形迹，然而很容易呈现为一种“若未有形迹”的状态，必具体化而后表现，

1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·知难》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第126—127页。

2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·文德》，第60页。

3 陈寅恪在解读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时就提出：“欲了解此诗，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，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。”而“唐人小说，例以二人合成之。一人用散文作传，一人以歌行咏其事”。这是唐代贞元、元和间兴起的一种新文体，与当时的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。明白了唐代小说中“歌”与“传”相配的言说风习，就能知道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与《长恨歌》“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，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”。陈寅恪：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—5页；《论再生缘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05页。

4 朱熹：《答曾择之》，《朱熹集》，郭齐、尹波点校，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，卷六十，第3110页。



可理解。

对史学而言，最主要的首先是往昔之“迹”的存留。孟子曾说，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（《离娄上》）。其言外之意，似乎后世奉为史学宗主的《春秋》，从一开始就与往昔之“迹”的存亡相关。《四库提要·史部总叙》（卷四十五）曰：“苟无事迹，虽圣人不能作《春秋》；苟不知其事迹，虽以圣人读《春秋》，不知所以褒贬。”¹中国古代史学非常重视记录的功能²，大概也有不希望前人事迹熄灭消逝的意思在。清季一位不署名的作者曾说：“历史者，摄过去之影而留其迹者也。”³梁启超进而提出，“凡事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。史家能事，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。”⁴

本书略本此探索、保存、并以解读“活化”史迹之意，借《庄子》之言而名之。其涉及的时段，大约起自清道光年间，略同于今日内地通行的“近代史”分期。唯主体论述侧重于甲午到五四期间，大致以北伐为下限（亦不时往后延伸）⁵。因为民国虽然取代帝制，但北洋政府在具体治理方式上，对前清君主制似乎继承多而革新少，颇有些“汉承秦制”的意味⁶。到北伐后国民党当政，开以党治国之先河，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改变⁷。如前引张季鸾所说，以

1 《四库提要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影印，卷四十五，第397页。

2 参见罗志田：《知人论世：陈寅恪、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》，《读书》2008年第6期。

3 不署名：《中国之改造》，《大陆》（1903），张枏、王忍之编：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》，卷一上，三联书店，1960年，第416页。

4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七十三》，第1—2页。

5 本书出版之时，正值“五四”九十周年，这是一个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，也是中国读书人永难忘怀的一个日子，故所选文略偏重之。

6 高一涵在民初就说，民国不过“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，而店中所卖的，还是那些皇帝‘御用’的旧货”。高一涵：《非“君师主义”》，《新青年》第5卷第6号（1918年12月），第551—552页。

7 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孔祥熙在北伐取胜时说，“从前广东每年省库收入，仅三千万，而人民已不胜其苦；及归国府统辖，每年收入一万亿元，而人民负担并不觉其重”（《建设的革命·孔祥熙二十四日在青年会讲演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28年6月28日，第6版）。宋子文在广州政府时期推行西式的税收改革，所收数倍于前，而常受中外史家称赞，他们大概都和孔祥熙一样地解读广东人民的感受。



千年以上的长时段眼光看，辛亥和北伐两次革命，可以说是“一大问题之继续演进”；但具体而论，它们又确实代表着“近代史上之两个时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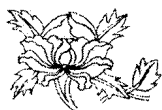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专为香港“三联人文书系”所编的文集。丛书的“编辑体例”要求“选文以学术性为重，但希望有较大的接受面”。根据这一要求，我所选的都是相对短小的文字¹，多数近于西人所谓“研究讨论”(research notes)，即较少提供结论性的判断，而更多是提出可以思考的问题。换言之，书中所讨论的问题，多数不一定能“解决”，甚或不一定需要“解决”。这类文字的论述方式往往点到为止，无意于细致深入的分析；但在思考的层面，与更“正式”的学术论文并无深浅之分。

这次选编时，入选的文字大都有所改动，多数是将较长的句子缩短，或对有些一般读者可能产生疑问的简短文字稍增一两句引申的解说，并对各文发表后相关的研究进展增加一些说明性的注释；有的还适当调整结构，将偏长的论述进一步分节；也有一两篇文章增添了较多篇幅，个别甚至增加了整整一节。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希望能让更多的非专家也可接近于“一目了然”的地步。各文之基本立意和论述，则仍其旧。

2008年8月于北京

¹ 拙文皆以专业学人为预设读者，且大多偏长，按这丛书所规定的字数，大约只能容纳三篇文章。

目录



自序 / 1

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/ 1

数千年中大举动：废科举百年反思 / 29

新旧之间：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“失语”群体 / 49

大纲与史：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/ 61

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 / 75

涟漪重叠：“五四”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 / 89

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/ 113

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/ 141

作者简介 / 155

著述年表 / 156